

侈言與逡譯：郭嵩燾《使西紀程》的西文史料稽考

李佳奇*

一、引言

中英《煙臺條約》(1876)簽訂後，郭嵩燾(1818–1891)以首任駐英公使的身分，前往倫敦履職。他遠渡重洋，途經香港、新加坡等英屬殖民地，考察、記述各地的管治狀況。抵達英國後，郭嵩燾以航行紀錄為底本，編製出使西方日記一冊，供清廷決策參考。¹始料未及的是，這本題為《使西紀程》的日記付梓後，卻旋遭禁燬。

拙文蒙三位匿名專家審閱賜教，又承學報編輯朱國藩先生、鄭麗娟先生先後斧正，不勝感激。筆者蒐集史料與寫作期間，受關詩珮教授悉心指導；初稿於2019年6月9日在劍橋大學與英國漢學研究生協會主辦的「中國新時代的全球角色」(China's Global Role in the New Era)研討會上發表，亦獲與會學者提問反饋，謹致謝忱。

* 李佳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¹ 關於《使西紀程》的成書緣起，以往研究者多援引郭嵩燾晚年致李鴻章(1823–1901)信函，指他出使前與總理衙門議定每月編寫日記提交，但未明確編制日記的職責根據。明文記載駐外公使編製公務日記之責，目前最早可見於總理衙門的外交參考書《星輶指掌》(1876)。該書為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兼萬國公法教習丁韞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主持編譯。書中第八章〈論使臣所任之事〉首節「使臣勤公總論」，有「使臣雖不必博鴻儒之名，亦當留心實學，既廣見聞，亦慰岑寂。欲知彼國情形，須讀其史記詩文，訪查彼地土產、機巧造作，以及軍旅之事。見聞既多，而又不自炫耀，則人自不敢輕視」，並註有「當立日記簿，每日見聞之事，俱登入簿，以備查閱。每張須留空白，以備增補改易」。郭嵩燾出使前已通讀此書，日記有「同文館教習丁韞良見示《星輶指掌》譯本，因相就一談，兼晤李壬叔。第四十九節、五十節尤多見道之言」。李壬叔，即李善蘭(1811–1882)，嘗任同文館算學總教習。據譯本章節標示，郭嵩燾稱道的兩節，即為第八章首節「使臣勤公總論」與次節「論使臣處世之道」。郭嵩燾或因此書，始知駐外使臣編製日記之責。當然，中國歷代王朝亦要求出使大臣編製遊歷日記，此舉可追溯至《周禮·秋官·小行人》，總理衙門商訂新規則時亦可能參考舊例。此外，尹德翔考證，駐外使臣彙報制度實於郭嵩燾日記燬版後方制定，茲不贅言。參見梁小進(主編)：《郭嵩燾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10冊，頁16、397；第13冊，頁460。馬爾頓(著)、葛福根(注)、丁韞良(譯)：《星輶指掌》(北京：同文館聚珍版，1876年)，第二卷，頁三六下；吳豐培、董盼霞、杜曉明(編)：《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1年)，第18冊，頁8–9；尹德翔：《東海與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0–32。

中外史學家關注《使西紀程》燬版原因已久。中文學界以梁啟超、蔣廷黻二人論說的影響最為深遠。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指郭嵩燾將夷狄歷史與華夏文明相提並論，顛覆了傳統華夷觀念，致使日記燬版。²同樣立足於進化論史觀的蔣廷黻則認為，《使西紀程》不為世容之因在於郭嵩燾提倡學習西方政治文化制度過於超前。³英文學界則深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與鄧嗣禹(1905–1988)「衝擊—回應」理論的影響，將燬版歸因於郭嵩燾公然背棄尊華鄙夷的「朝貢體系」。⁴上述論者論述重點雖然不同，但均著眼於中國現代化課題，將燬版歸根為郭嵩燾衝擊了當時主流的「華夷之辨」，把他塑造成傳統文化的異端與現代文化的先知這一雙重形象。⁵

此外，亦有學者探究郭嵩燾的儒學思想與現代性之間的諸種關聯，以消解傳統學術與中國現代化二者非黑即白的敘述張力，如楊聯陞指出郭嵩燾的涉外方略實延續了漢代以來的「羈縻」外交政策；⁶郭廷以則將郭嵩燾的循理洋務觀，上溯至明末清

² 沈鵬(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冊，頁4030–31。

³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藝文研究會，1938年)，頁68–69。

⁴ 費正清與鄧嗣禹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一書中首次提出「衝擊—反應」，該書尚翻譯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以及薛福成(1838–1894)1890年5月1日論及郭嵩燾遭詆譏的日記，參見 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43–44, 267–74; Immanuel C. Y. Hsü,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88–89, 201–2; J. D. Frodsham trans.,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the West: The Journals of Kuo Sung-t'ao, Liu Hsi-hung and Chang Te-yi*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74), pp. xxxix–xlvi; Owen H. H. Wong 黃康顯, *A New Profile in Sino-Western Diplomacy: 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Great Britain* (Hong Kong: Chung Hwa, 1987), pp. 139–40。

⁵ 上述理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仍有學者接續拓展，參見熊月之：〈論郭嵩燾〉，《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頁173–74；鍾叔河：〈論郭嵩燾〉，《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頁127–36；曾永鈴：《郭嵩燾大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30–36；王國興：《郭嵩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49–52；雷俊玲：〈清季首批駐英人員對歐洲的認識〉(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99年)，頁67–76；吳寶曉：《初出國門：中國早期外交官在英國和美國的經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5–87；楊湯琛：〈郭嵩燾「越界」的域外書寫與現代性體驗的發生〉，《文藝評論》2011年第12期，頁152–53；尹德翔：《東海與西海之間》，頁106；Qingsheng Tong, “Guo Songtao in London: An Unaccomplished Mission of Discovery,” in Elaine Yee Lin Ho and Julia Kuehn, eds., *China Abroad: Travels, Subjects, Spa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5–61。

⁶ 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33.

初王夫之(1619–1692)的「理」、「勢」之說。⁷中英日學界均有研究關注郭嵩燾的儒門學者身分，⁸日記禁燬則解釋為郭嵩燾以儒學來詮釋西方政教，顛覆了當時主流的儒學價值觀。⁹關於燬版原因，以往研究側重運用漢文史料探討《使西紀程》遭受晚清士大夫抵制的詳情，並將之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挫折。

罕為人知的是，十九世紀的西人頗為關注中國首位駐外公使的動態，¹⁰不僅在日記出版前已知曉郭嵩燾的寫作計畫，更在燬版後數度翻譯、評論《使西紀程》。倫敦、香港與上海等多地英文報刊認為，郭嵩燾在其中一則日記「據實直言」西方富強，因而觸怒當局。¹¹然而，清廷諫官卻將同一則日記視為誇大西洋國情的「不實侈言」，促請清廷將原已贊助刊印之書燬版。中西讀者為何會產生如此相悖的閱讀體驗？是雙方接觸的中英文本不同，抑或是中西文化語境有別？

⁷ 郭廷以(編定)、尹仲容(創稿)、陸寶千(補輯)：《郭嵩燾先生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頁3–4。

⁸ 參見 Man-Shing Tsui, “An Advocate of Conciliation: Kuo Sung Tao’s Attitude Towards Sino-Western Relation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73), pp. 151–53, 179–81；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65–66；陸寶千：《清代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82、387；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頁325；黎志剛：《郭嵩燾的經世思想》，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509–30；D. R. Howland, *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5–6, 226；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頁80–81；手代木有兒：〈清末初代駐英使節(1877–79)における西洋体験と世界像の変動(3)：文明観と国際秩序観〉，《商学論集》第68卷第2号(1999年8月)，頁93–104；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頁178–85；張靜：《郭嵩燾思想文化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2–26，106–11；Zhengzheng Huangfu, “Internalizing the West: Qing Envoys and Ministers in Europe 1866–189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12), pp. 162–215；岡本隆司、箱田恵子、青山治世：《出使日記の時代：清末の中国と外交》(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頁52–53；Jenny Huangfu Day,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24–54。

⁹ 詳見上一註解中 Man-Shing Tsui、D. R. Howland、Jenny Huangfu Day 與岡本隆司等的論述。

¹⁰ 郭嵩燾駐倫敦兩年間贏得極好的聲譽，英國傳記家 Thompson Cooper(1837–1904)視郭嵩燾為當代政治偉人，稱他讓中國獲得英國的尊重與愛戴，並提到他曾遭受本國不同政見者詆譏，詳見 *Men of Mark. A Gallery of Contemporary Portraits of Men Distinguished in the Senate, the Church, in Science, Literature and Art, the Army, Navy, Law, Medicine, etc., photographed from life by Lock and Whitfield, with brief biographical notices by Thompson Cooper*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1880), p. 18。

¹¹ 《使西紀程》1877年1月19日條，本文將在第六節分析探討。

本文利用大英圖書館與各地檔案部門的史料，考證先後於倫敦、香港、上海三地出版的未署名譯本，重新探討《使西紀程》的傳播、翻譯與評述情形。本研究將考辨長期為史學界忽略的譯介者身分及其翻譯動機，推斷英國傳教士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香港報業家陳言 (?–1905) 與上海報社主編蓋德潤 (Richard Gundry, 1839–1924) 為出使日記的關鍵譯介者，並指出上述三名譯介者於十九世紀中後葉已將日記燬版置於「華夷之辨」的討論框架下。文末將重返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1860) 以降的西學脈絡，從觀念「迻譯」的角度，辨析日記的爭議之處。重新檢視《使西紀程》「直言」與「侈言」定位之爭，期望有助於彌補現有研究的空缺，為日記燬版一案提供新證。

二、他者的目光與論述

目前學界並未曾以西人的報導、轉譯與評析為材料，探討《使西紀程》燬版的原因。前人已發掘的相關史料包括新聞報刊、郭嵩燾日記與清廷奏摺三類。中文報導除了《萬國公報》於 1877 年 6 月始連載的《使西紀程》外，¹² 尚有《西國近事彙編》於 1878 年轉譯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 的燬版報導。¹³ 有學者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首次出版的四冊郭嵩燾日記，指出郭嵩燾曾於 1878 年謝絕密斯盤 (筆者考作 John Bourne, 1813–1894) 之邀請，刊登駐英見聞。¹⁴ 至於官方奏摺方面，近年有學者利用荷蘭公使

¹²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pp. 175–76; 《萬國公報》於 1877 年 6 月 2 日至 8 月 4 日期間連載《使西紀程》，每 7 日一刊，除 6 月 9 日中斷外，共連載 9 卷。主編林樂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從第 2 卷始將《使西紀程》刊載位置調整到「大清國」欄目即刊首欄目，頗重視日記，參見上海圖書館 (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 卷，頁 101–5。

¹³ 《郭嵩燾先生年譜》，頁 759–60。

¹⁴ 黎志剛：〈郭嵩燾的經世思想〉，頁 511。密斯盤與郭嵩燾多有交往，兩人曾在英國商討上海格致書院、博物院、軍備、郵局等事宜。鍾叔河、楊堅據音考作 Payne，而不詳其生平。筆者查證「密斯盤」應為 Mr. Bourne 的音譯，即英國皇家工程師 John Bourne, C. E.。就讀音而論，郭嵩燾亦提及密斯盤之名為約翰盤，且註明李鳳苞 (1834–1887) 稱之為「蒲恩」，與 John Bourne 發音極相近。John Bourne 著有一系列關於蒸汽機的書籍，於 1878 年出版的 *Examples of Steam, Air & Gas Engines of the Most Recent Approved Types as Employed in Mines, Factories, Steam Navigation, Railways, and Agriculture* 扉頁特意獻辭給郭嵩燾：“I dedicate this work to his Excellency Kuo Sung-Tao, the minister of China at the courts of England and France, and the first regularly appointed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sent by China to a foreign country, whose enlightened views combined with tact, talents and dignity of character have contributed to elevate the great nation he represents in the eyes of Europe, and who has succeeded in conciliating sympathies which may prove of eminent and enduring value to the best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此段獻詞不僅是兩人友誼的見證，且與郭嵩燾日記

費果遜 (Jan H. Ferguson, 1826–1908) 於 1878 年請求更正日記中關於荷蘭國事謬誤之摺。¹⁵ 此外，目前已發掘的英文文獻為上海 1878 年《北華捷報》(*The North-China Herald*)，評議《使西紀程》傳教之見的報導。該篇報導收錄於傅樂山 (John Frodsham, 1930–2016) 的譯作附錄中。¹⁶ 綜合現已披露的中英史料，讀者僅能獲得浮光掠影的印象：西人留意《使西紀程》，始於日記轉載出版後，於燬版發生後次年才有更多關注。

實際上，西人甚為關注清廷首位駐英公使的動向。在《使西紀程》正式印製前，西人已得知郭嵩燾編寫日記的目的、取材等細節。《使西紀程》於 1877 年 2 月初定稿，5 月至 6 月期間題名刊刻。¹⁷ 就筆者蒐集的英文報刊顯示，1877 年 2 月中旬已有英人獲悉中國公使編寫遊記之舉，且詢問得知「他已收到本國皇家掌權者的指令，為本人的遊歷紀錄收集資料，以便歸國後將之出版」。¹⁸ 同日，另一則消息稱中國使團

〔上接頁 122〕

1878 年 10 月 4 日中提及「密斯盤近著《機器用法》一書」相吻合。此外，郭嵩燾日記記錄英文報刊 1878 年初，介紹密斯盤生平的文字，「英國公司輪船創始密斯盤尊人，時為水師兵官……密斯盤於機器汽爐創立新法」。John Bourne 之父 Captain Richard Bourne (1787–1850) 正是英國鐵行輪船公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的創始人之一。筆者亦找到《科學美國人副刊》(*The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曾轉載英國關於 John Bourne 的報導，內容涵蓋了郭嵩燾同年摘錄的報導，參見郭嵩燾(著)，鍾叔河、楊堅(整理)：《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頁 1094；《郭嵩燾全集》，第 10 冊，頁 170、216、226、312、342、351、393、437、442、453、615；John Bourne, C. E., *Examples of Steam, Air & Gas Engines of the Most Recent Approved Types as Employed in Mines, Factories, Steam Navigation, Railways, and Agricultu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8); *The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5, no. 115 (16 March 1878), p. 1821。

¹⁵ Day,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pp. 141–42.

¹⁶ Frodsham,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the West*, pp. 184–86.

¹⁷ 郭嵩燾 1877 年 1 月 21 日抵英後忙於公務應接，至 2 月 8 日方首次寄送公文回國，故日記定稿時間最早可確定為 2 月初。又，李鴻章 1877 年 5 月 1 日覆總理衙門信中提到「昨奉三月十三日公函，鈔示筠仙星使沿途日記一本」，5 月 9 日致信郭嵩燾語及「總署抄寄行海日記一本，循覽再四，議論事實多未經人道者，如置身紅海、歐洲間，一拓眼界也」。李鴻章閱讀的日記為總署衙門抄本，且信中未及《使西紀程》之名，可知日記定稿本雖已寄達中國，但此時可能尚未題名及付梓。李鴻章 1877 年 7 月 24 日(編者誤考為 1878 年)回覆長兄李瀚章(1821–1899)信件始提及《使西紀程》之名與燬版事由：「昨周筱棠函告，何鐵生講官(武昌人)參奏，指筠仙《使西紀程》內今日中西交涉並不得謂和等詞意，詎以大清無此臣子，請飭銷燬此書。蓋總署已將此本用活字板擺印，傳觀唾罵固不待言。」周筱棠即總理衙門大臣京章周家楣(1835–1887)。參奏的講官何鐵生，為日講起居註官、翰林編修何金壽(1834–1882)。據此信，日記出版題名時間應在李鴻章致信郭嵩燾後，清廷下令禁燬前，即 1877 年 5 月至 6 月間。參見《郭嵩燾全集》，第 10 冊，頁 99；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32 冊，頁 21、25、338。

¹⁸ 本文援引的英文文獻均為筆者翻譯。*The Sporting Gazette* 15, no. 771 (February 1877), p. 157: “. . . he has received strict injunctions from his Royal master to gather materials for a record of his travels to be published on his return.”

成員正忙於記錄出使途中的「所見所聞」(all they see and hear)，並枚舉使團對倫敦火車等事物的看法。¹⁹此外，有報導透露中國公使即將寫一本「有關英國的書」(a Book about England)或「倫敦指南」(a Guide to London)。²⁰這些零星報導，反映郭嵩燾的寫作計畫在英國已受關注。

不過，除非日記有英譯本，英文讀者仍無法知道郭嵩燾的寫作內容。翻譯是一類語言文化接觸、理解另一類語言文化的起點。然而，這種中介卻非常人所認知的那般公正透明。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已指出，語言文化、贊助關係、出版機構，以至譯者個人動機等因素，會影響選譯的對象以及呈現的內容。²¹這些文化轉譯現象，也見於《使西紀程》三個英譯本的成書與流傳。最早的倫敦譯本是漢學傳教士為推廣中國知識而作，其他兩個譯本，則是對禁燬新聞的回應。三個譯本的譯者不僅傳遞郭嵩燾的見解，也論述出使日記與清廷政權之間的關係。這種譯介思路反映了出使日記這種文類當受重視的另一原因：它不僅是清人實地考察西洋的文字見證，也是十九世紀西方觀察晚清政治氣候的風向標。因此，以翻譯研究為視點，探討《使西紀程》在中英交流史上的作用，對於釐清中國現代化視野的盲點，或者不無幫助。

為把握日記英譯傳播的狀況，筆者把關鍵日期表列如下：

事由 / 版本	時間	出版媒介
上奏燬版	1877年6月16日	無
倫敦譯本	1877年10月	《休閒時》(<i>The Leisure Hour</i>)
燬版報導	1877年12月14日	《孖刺西報》(<i>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i>)
香港譯本	1877年12月至1878年1月	《德臣西報》(<i>The China Mail</i>)
上海譯本	1877年12月至1878年1月	《字林西報》(<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i>)

¹⁹ *The Northampton Mercury* 156, no. 8151 (February 1877), p. 5.

²⁰ *The Western Mail*, no. 2436 (February 1877), p. 2.

²¹ 早期翻譯理論旨在探討如何運用各類翻譯策略來實現不同符號系統之間的等值轉換，後期的翻譯理論則以非等值性來探討影響翻譯活動的各類因素，代表人物及著作有：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Methuen, 1980);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Andrew Chesterman,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Maria Tymoczko,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 (London: Routledge, 2014).

從上表可知，燬版新聞見報時間為1877年12月14日，即燬版案件發生後半年左右。報導時間遲緩與禁燬消息在清廷傳播的方式有關。與燬版給人的轟動印象不同，清廷雖即日批准奏請，²²卻始終未將燬版一案昭示於眾。因此，禁燬消息最初僅在京吏之間流傳。為學界所頻頻徵引的清吏日記，如李慈銘(1830–1894)《越縵堂日記》、王闈運(1833–1916)《湘綺樓日記》等，至同年七、八月之交，始記禁燬始末，²³僅比遠駐倫敦的郭嵩燾早十餘日。²⁴與朝廷官員略有交往的《申報》，以及連載出使日記的《萬國公報》，於燬版一事更是隻字不提。²⁵英文報刊究竟從何處得知日記的禁燬消息？為何前後有三個譯本出現？種種疑問，將在以下各節，逐一釐清。

三、消除中國定見的倫敦譯本

《使西紀程》的最早譯本刊登於英國聖教書會(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經營的世俗刊物《休閒時》。²⁶譯者將標題定為“Diary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標題下尚有小字“Voyage to Europe”直譯日記原名。²⁷當時身處外交圈外者，因不熟諳專業術語，常誤會郭嵩燾的外交職銜。郭嵩燾的職銜為「二等欽差大臣」，對應英譯為“Envo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而非“Ambassador”。²⁸此外，譯者將「郭嵩燾」的姓名翻

²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冊，頁141。

²³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10冊，頁7453–56；王闈運：《湘綺樓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第1冊，頁579–80。此外，時任天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亦由周家楣函告而知燬版詳情，參見註解17。

²⁴ 郭嵩燾1877年8月18日從張斯桂(1816–1888)來信得知日記燬版，參見《郭嵩燾全集》，第10冊，頁260。

²⁵ 《申報》於9月尚登出題為〈諭欲效西法〉的論說，稱讚「郭侍郎《使西紀程》原本亦多贊美西法之善，可見身入其境，斷不能不信服其善也」。見《申報》，第1649號(1877年9月8日)，第1版；林樂知極有可能於1878年1月從港報獲知燬版事，他主編的《萬國公報》卻僅提及香港西報已翻譯郭嵩燾日記，並稱「然西國人見此書中之意多顯，郭欽使之卓識也」。見《萬國公報》，第474卷(1878年1月26日)，頁333。

²⁶ 《休閒時》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頗有影響力的家庭讀物，內容以歷史、科普與文學為主，讀者包括英國工人階級與教會的中產階級支持者，詳見 Doris Lechner, *Histories for the Many: The Victorian Family Magazine and Popula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The Leisure Hour, 1852–1870*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7), pp. 221–23。

²⁷ James Macaulay and William Stevens, eds., *The Leisure Hour*, no. 1347 (October 1877), pp. 660–63.

²⁸ 英國漢文參贊梅輝立(William Mayers, 1831–1878)是譯介中國官職體制的先驅，他的遺作《中國政府：中文頭銜類別及解釋手冊與附錄》亦附錄了英國外交官職對應漢譯，參見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Manual of Chinese Titles, Categorically Arranged and Explained, with an Appendix*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譯為“Kwo Sungtau”，而非外交公文慣用的“Kuo Sungtao”，疑改進自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注音體系。²⁹單從外交術語誤用與拼音系統偏好來看，這名譯者應未與英國外交部合作。《休閒時》是英國家庭讀物，無關外交。那麼，這個匿名譯本要傳遞的是哪種觀念？譯者身分又如何確定？

比對郭嵩燾日記可知，倫敦譯本實為選譯本。頭尾兩處增補文字揭示，譯本旨在推介郭嵩燾為熱衷西洋知識的友善人士。譯文開頭稱，「我們提供這份日記摘要，足以證明郭嵩燾是一個機敏聰慧之人。他抵達英國之後我們就知道，他既彬彬有禮又天性純良。這份由他本人與隨員寄往本國的報告，無疑將在中國引起熱切關注」。³⁰末段詳述了這些讚譽：「從這份日記足見，這位前任廣東巡撫、現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極具開明思想，熱衷從眾多知識門類中汲取新知。他熟諳史籍，提倡和平政策，這將使他的國家獲益無窮。他的自由觀念源於他的學習能力。他異常渴求知識，有助他穩當地判斷一切人事。他駐歐的益處之一是，他的著述將會幫助本國同胞看到西方世界的真實情況。」³¹日記記載的旅途見聞，是郭嵩燾樂於接納國外新事物的佐證。英譯本兩處增補文字，正解釋了譯本為何仔細地翻譯了日記所載的種種見聞。

〔上接頁125〕

1878), pp. 146–51；另郭嵩燾曾商約覲見英國女王之日，他的信函落款職銜為「中國公使」（Envoy of His Imperial Majesty），參見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 17/768, “Kuo Ta jen to Earl of Derby” (24 January 1877)。為確保行文準確，筆者將西文史料記錄郭嵩燾之職為「大使」之處均更正譯為「公使」。

²⁹ 若按照馬禮遜、衛三畏 (Samuel Williams, 1812–1884) 與威妥瑪 (Thomas Wade, 1818–1895) 三人的官話拼音系統，「郭嵩燾」之名應分別標註為 Kwo Sungtaou、Kwoh Sungtau 與 Kuo Sungtao。傳教士英華辭書家羅存德 (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 曾比較三人的官話拼音系統差異，詳見 Rev. 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6), pp. 30–37。

³⁰ James Macaulay and William Stevens, eds., *The Leisure Hour*, no. 1347 (October 1877), p. 660: “We give an abstract of this journal, in which there is enough to show him to be a man of shrewdness and intelligence, as we have all found him to be since his arrival in England, and also a man of much courtesy and good-nature. The reports sent home by himself and his staff will no doubt be read with avidity in China.”

³¹ Ibid., p. 663: “From this journal it is plain that the Chinese ambassador now in England, Kwo-sung-tau, formerly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of Canton, has a mind very open to receive new facts from the most various departments of knowledge. He is well read in history, and is in favour of a peaceful policy, as that which will be most for the good of his country. The liberality of his views is the result of the receptivity of his mind. His appetite for knowledge is exceptionally great, and it helps him to form safe judgments of things and persons. One beneficial result of his residence in Europe will be that his published narratives will do much to open the eyes of his countrymen to the true state of things in the Western world.”

倫敦譯本近乎翻譯了日記的所有條目，而每則日記的翻譯側重各有不同。正文有兩處增譯文字涉及譯者的經歷：其一，譯者糾正郭嵩燾途經中國南海(South China Sea)，關於「飛魚」(flying fish)的描述，指郭嵩燾看見的「飛魚」應為「鼠海豚」(porpoise)；進而解說生活在海域的「鼠海豚」品種，體型略大於生活在中國河域的「江豬」(river hog)。³²譯者深諳中國水域生物，極可能曾造訪中國；其二，譯者採用意譯的方式來處理中文術語，如將「春秋列國」改寫為貼近西方讀者認知水平的“at the time of which Confucius wrote the history”，「鐘鼎文及古篆籀」則增譯為“the writing on ancient bells and urns in China, and on the stone drums preserved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Peking”。³³這些細節透露譯者熟知中國典籍與文物，掌握一定的漢學知識。

這位匿名譯者實為負責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北京事工的艾約瑟。³⁴英國刊物《學會》(*The Academy*)於1877年9月末刊登的一封信件，成為破解譯者身分之謎的關鍵。³⁵這封信件註明由艾約瑟在1877年7月18日於中國煙臺寄出。信件前半部簡述《使西紀程》的內容，以及中國政府刊印的動機；後半部則推介禁煙協會的出版物，並傳達協會與中國公使不同的禁煙意見。艾約瑟開門見山讚譽道：「近期出版的中國駐英公使日記，清楚表明郭嵩燾是一名擁有自由觀念之人。」³⁶艾約瑟在信中評論的角度與內容簡述，多與譯本相合。為英譯本未嘗提及的是，艾約瑟在信中推斷日記的出版與中國政府決策有關，他說：「北京政府迅速刊印這本日記，

³² Ibid., p. 660.

³³ Ibid., p. 662.

³⁴ 艾約瑟1843年赴中國傳教並參與創辦上海墨海書館，1880年退休後應聘為中國海關翻譯。郭嵩燾1856年3月15日參觀墨海書館時與艾約瑟有一面之緣，並稱其「學問尤為粹然，麥都事所請管理書籍者也」。麥都事即為英國傳教士與墨海書館的負責人麥都思(Walter Medhurst, 1796–1857)，見《郭嵩燾全集》，第8冊，頁31；關於艾約瑟生平及在中國傳教始末可參見S. W. Bushell, “Obituary: Rev. Joseph Edkins, D.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anuary 1906), pp. 269–71; Pat Barr, *To China with Love: The Lives and Time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60–1900*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72)。

³⁵ 《學會》為牛津大學教授查爾斯·阿普爾頓(Charles Appleton, 1841–1879)於1869年創辦，主要推介藝術、科學、宗教、歷史等領域的學術書籍，參見Laurel Brake and Marysa Demoor, eds., *Dictionary of 19th Journalism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Academia Press and British Library, 2009), pp. 1–2；阿普爾頓從事《學會》編輯近十年，詳見Diderik Roll-Hansen, *The Academy, 1869–1879: Victorian Intellectuals in Revolt* (Copenhagen: Rosenkilde and Bagger, 1957)。

³⁶ Joseph Edkins, “LETTER FROM CHINA,” in Charles Appleton, ed., *The Academy: A Record of Literature, Learning, Science, and Art* 12, no. 281 (22 September 1877), p. 296: “The recently published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England* shows with sufficient clearness that he is a man of liberal mind.”

且定價低廉，可能旨在向公眾推廣自由觀念。」³⁷此外，他指出清廷官員的開放觀念：「他們想要鐵路和電報，卻不願冒險面對因強行實施這些工程而引發的強烈抵制。他們希望公眾知道對外政務，故借此契機，推廣中國駐英公使的見解。公使的見解，將成為中國的對歐政策。」³⁸艾約瑟這些論述，意在向西方讀者介紹郭嵩燾的開明見解，以及清廷的變革困境。同時，信件也透露了艾約瑟於七月中下旬，尚未得知禁燬一事。

在華傳教的艾約瑟與所屬的倫敦傳教會之間，聯絡主要以書信方式進行。³⁹他也與英國《學會》雜誌和聖教會書會，保持密切的學術交流。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艾約瑟在《學會》刊物上署名發表書評與通信，並引介顧觀光(1799–1862)《九數外錄》、張自牧(1833–1886)《瀛海論》、李圭(1842–1903)《環遊地球新錄》與董恂(1807–1892)

³⁷ 目前尚無直接史料證實清廷曾以低價推銷《使西紀程》，不過這點有助於下文分析英國報刊的廣告語，故加徵引。《使西紀程》以低價發售，確有其事，《申報》於1877年5月28日、5月30日、6月1日與6月4日分別刊登了題為〈《使西紀程》出售〉的廣告：「茲有新印郭侍郎《使西紀程》一書寄存在二馬路千頃堂書坊出售，每本計工價實洋一角正，是書詳述由滬至英京沿途風土形勢，人情物產歷歷如繪，兼及考據議論，博達精通，一時西事諸書罕其儔匹，想有識者當能共欣賞焉。」《使西紀程》定價「洋一角」，與艾約瑟所言定價低廉相符。此外，《申報》於1884年5月刊登的〈簡玉山房發兌書籍〉廣告中亦有《使西紀程》，售「二角」。《晚清營業書目》收錄的〈上海緯文閣發兌石印時務算學新書目錄〉未註明時間，其中亦有《使西紀程》，售「洋貳角」，參見Edkins, "LETTER FROM CHINA," p. 296: "The object of the Government in Peking in so promptly printing this Journal, and allowing it to be put on sale at a cheap rate, is probably to familiarise the public mind with liberal views." 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438；《申報》，第1560號(1877年5月28日)，第5版；第1562號(1877年5月30日)，第6版；第1564號(1877年6月1日)，第8版；第1566號(1877年6月4日)，第8版；第3974號(1884年5月8日)，第5版；第3975號(1884年5月9日)，第6版；第3980號(1884年5月14日)，第7版；第3983號(1884年5月17日)，第7版；第3987號(1884年5月21日)，第6版。

³⁸ Edkins, "LETTER FROM CHINA," p. 296: "They wish for railways and telegraphs, but they do not venture to risk the formidable opposition they would certainly incur by vigorously commencing their construction. They desire to see the mind of the reading public enlightened on matters of foreign policy; they are glad of the opportunity of circulating widely the opinions of the ambassador to England on what ought to be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nations of Europe."

³⁹ 艾約瑟與倫敦傳教會的往來通信檔案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1877年間的信件內容有關傳教以及妻子病逝等事。這些信件顯示他該年頻繁奔波於上海、北京兩地。艾約瑟與英國之間的聯繫應僅限於通信，參見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North China/Incoming Correspondence /18/02/018, "Joseph Edkins to LMS" (27 January 1877), (9 April 1877), (21 April 1877), (16 June 1877), (28 December 1877)。

《永寧祇謁筆記》等中文圖書。⁴⁰1878年，艾約瑟評論《環遊地球新錄》時，指李圭的學術遠不及郭嵩燾(Kwo Sungtau)。⁴¹這個注音與倫敦譯本完全一致，補足他1877年9月評論《使西紀程》的通信中，未提郭嵩燾姓名之缺。另一方面，《聖教書會年度國內外報告》(*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Record of Work at Home and Abroad*)以及1877至1878年《聖教書會年度報告》(*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記錄他曾接受聖教書會資金贊助，在中國創辦《益智新錄》。《益智新錄》原本計畫沿用聖教書會經營的《休閒時》之名。⁴²這些證據顯示艾約瑟極熱心成為中西文化的中介者。這是他從事日記英譯的重要旁證。

此外，英文報刊《梅菲爾》(*The Mayfair*)的推銷廣告，證實倫敦譯本是刻意安排在《休閒時》上刊登的。《梅菲爾》於10月2日率先刊登譯本銷售消息。對比其他新聞廣告，⁴³《梅菲爾》的推介理由特別值得留意：「中國政府正以非同尋常的自由刊印這本日誌，並以低廉的價格出售。此舉似為了改變國人對待外國人的態度。這是恭親王奕訢等少數有遠見的中國人期望已久的。」⁴⁴如前所述，艾約瑟曾在《學會》上發表的信件中，提及日記的定價與清廷決策之間的關係，未在《休閒時》刊載的譯文中透露端倪。這則匿名廣告竟如此準確轉述艾約瑟發表在《學會》的觀點，可見廣告出於知情者之手。此外，譯本與信件極可能是一起寄往英國，之後才刊登在不同的刊物。

⁴⁰ Joseph Edkins, "RECENT CHINESE BOOKS," in Charles Appleton and Charles Doble, eds., *The Academy: A Record of Literature, Learning, Science, and Art* 13, no. 312 (27 April 1878), p. 371; idem, "PEKING LETTER," in Doble, ed., *The Academy: A Record of Literature, Learning, Science, and Art* 14, no. 323 (13 July 1878), pp. 38–39; idem, "TWO NEW CHINESE BOOKS," in Doble, ed., *The Academy: A Record of Literature, Learning, Science, and Art* 14, no. 339 (2 November 1878), pp. 429–30.

⁴¹ Edkins, "TWO NEW CHINESE BOOKS," p. 429.

⁴² *The Seven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For Publishing Religious Tracts and Books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Pardon and Son, 1877), pp. 222–23, 225, 230–31; *The Seven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For Publishing Religious Tracts and Books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Pardon and Son, 1878), pp. 164–66;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Record of Work at Home and Abroad* 2 (1877), p. 29.

⁴³ *The Trewman's Exeter Flying Post* 115, no. 5877 (3 October 1877), p. 6; *The Taunton Courier* 70, no. 3680 (3 October 1877), p. 5; *The Cambridge Independent Press* 72, no. 3229 (6 October 1877), p. 8; *The Manchester Courier* 53, no. 6521 (8 October 1877), p. 3; *The Westmorland Gazette* 60, no. 3916 (13 October 1877), p. 3; *The Wrexham Advertiser* 29 (13 October 1877), p. 7; *The Manchester Weekly Times*, no. 1037 (27 October, 1877), p. 5.

⁴⁴ *The Mayfair* 2, no. 40 (2 October 1877), p. 15: "That Government is showing the unusual liberality of printing the Journal, and selling it cheaply, as if to prepare the Mandarins' mind for such a change in the treatment of foreigners, as a few of its most enlightened members, like Prince Kung, have long desired."

日記譯本刊登於大眾讀物《休閒時》，似乎旨在向英國讀者傳遞清廷推廣變革的現狀，以消除中國保守封閉的成見。

四、揭露禁燬真相的香港譯本

與倫敦譯本不同，香港、上海譯本出現在禁燬之事曝光後。1877年12月14日，香港《孖刺西報》首次將燬版案公佈於眾，並披露了日記的成書緣由、刊印數目、流傳範圍與奏摺大意等諸多細節。新聞稱，郭嵩燾奉命寫作日記，總理衙門刊刻上千份複本供高級官員傳閱，「幾近過半的冊子業已派出，而此時一名審查員上奏了一封措辭強硬的奏摺，請求皇帝將郭嵩燾的日記撤回。奏摺認為日記的觀點有損國威，把英國描述得遠勝中國。郭嵩燾實際道出了全盤事實，卻不被中國傲慢之心所容」。⁴⁵《孖刺西報》於12月20日重刊報導，並刊登一篇抨擊中國天朝心態的長篇社論，有意持禁燬案大肆宣揚。社論嘲諷清廷華夷之見，認為郭嵩燾日記「顯然已對那些愛慕虛榮的國人造成了嚴重的衝擊」，並堅信郭氏記述的事實將不會被掩沒。⁴⁶

香港譯本始載於《德臣西報》。這份報紙於1877年12月27日頭條位置宣佈刊登日記譯本，並指「郭在他日記後半部分的評論遭到國人如此反對，以至於我們相信，在審查人員具奏彈劾之下，這本已經出版流通的書被查禁了」。⁴⁷除提及日記後半部為禁燬要因外，這則消息還透露「一名報社譯者」(our translator)已獲得日記複本，並將不定期翻譯、披露日記內容。⁴⁸

事實上，《德臣西報》並非唯一獲得日記刊本的英文報社。現存資料顯示，香港、上海兩地報社於5、6月之交已取得《使西紀程》刊本。《中華快報》(*The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於5月24日稱收到郭嵩燾部分日記，並評論道：「他的看法儘管粗略，卻較斌椿之見更為深刻且更具智識，而他對於香港學校與監獄的描述

⁴⁵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255 (14 December 1877), p. 2: "Hardly half of these pamphlets had been distributed, however, when one of the censors presented a strongly-worded memorial to the Throne praying for the withdrawal of Kwoh Sung-tao's diary from circulation, as the memorialist considered the statements made in it reflected disgracefully upon China, since the Ambassador had described every thing in England as greatly superior to China—had, in fact, told the whole truth, which was unacceptable to Chinese pride."

⁴⁶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260 (20 December 1877), p. 2: "... have evidently been a severe shock to the vanity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⁴⁷ *The China Mail* 33, no. 4521 (27 December 1877), p. 2: "Kwo's remarks in the latter portion of his diary were so unfavourable to his own country, that the book, which had been printed and circulated to some extent, was, we believe, denounced by a Censor in a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Throne, and its publication suppressed."

⁴⁸ *Ibid.*

將使他本國同胞受益。我們將在其他場合更深入回到這一話題。」⁴⁹香港《孖刺西報》於6月初登載了這則報導，卻未注明資料來源，致使遠在悉尼的不少報刊誤報了消息出處。⁵⁰同期，德國《科隆日報》(*Die Kölnische Zeitung*)駐港通訊員，也披露郭嵩燾日記在少數密友間傳播的細節。⁵¹這些紀錄說明《使西紀程》刊印後旋即獲得西報關注，而報社的英譯計畫則在燬版新聞曝光後。

不過，香港譯本卻是未竟之作。《德臣西報》先後於1877年12月27日、12月31日以及1878年1月4日，匿名刊譯了郭嵩燾自上海出發，途經香港與新加坡期間的條目，沒有按既定承諾，刊行日記其他譯文。⁵²從譯文每隔四天發佈的規律，可知報社原計畫定期連載日記。為何報社發表了《使西紀程》前十日譯文後，旋即中止翻譯計畫？承擔英譯者又是誰？

《孖刺西報》報社編製的1877年版《中國、日本與菲律賓年鑑指南》(*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提供線索，考察譯者身分。查閱該書「德臣印字館」條目，可知印字館地址、印刷業務，以及館內職員名單。⁵³這家位於香港「雲咸街」(Wyndham Street)二號的印刷館業務頗豐，日常負責印製兩周一期的《中國陸路郵報》(*The Overland China Mail*)、晚報《德臣西報》、日報《華字日報》(*The Chinese Mail*)以及雙月刊《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印刷館為 Geo. Murray

⁴⁹ *The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 12, no. 1326 (24 May 1877), p. 2: “His reflections, though meagre, are much deeper and more intelligent than those of the late Pin-ch’un, while the account he gives of the schools and prisons of Hongkong is in itself a most useful lesson to his countrymen. We shall return to the subject more fully on another occasion.”

⁵⁰ 需要說明的是，香港公共圖書館提供的舊報紙數據庫未完整收錄1877年12月至次年2月間的《孖刺西報》、《德臣西報》，筆者轉而利用大英圖書館館藏膠卷，確認這段期間，並沒有與日記有關的報導。*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087 (1 June 1877), p. 2;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76, no. 12213 (10 July 1877), p. 5; *The Evening News*, no. 3125 (10 July 1877), p. 3; *The Sydney Mail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 24, no. 889 (14 July 1877), p. 56.

⁵¹ 《科隆日報》原文未見，消息內容參考最早轉載的英報《晨郵報》(*The Morning Post*)，轉載詳情見“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The Morning Post*, no. 32792 (3 August 1877), p. 5; *The South Wales Daily News*, no. 1699 (4 August 1877), p. 4; *The Trewman’s Exeter Flying Post* 115, no. 5869 (August 1877), p. 6。

⁵² 《孖刺西報》連載的譯文先後為上海《中華快報》轉載，參見 *The China Mail* 33, no. 4521 (27 December 1877), p. 2; 33, no. 4524 (31 December 1877), p. 5; 34, no. 4527 (4 January 1878), p. 3; *The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 2, no. 10 (12 January 1878), p. 3; 2, no. 12 (15 January 1878), p. 3; 2, no. 17 (21 January 1878), p. 3。

⁵³ 這本按年更新的指南服務寓居中國、日本與菲律賓三地的外國人，內容包羅萬象，包涵日曆、地圖、條約細則、廣告服務、城市指南與領事海關服務等，參見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77*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77), p. 210。

Bain 擁有，職員僅有七人，除了編輯 James Bulgin、記者 Chun Ayin、海事記者 James Mackay，還有四名外籍人士，分別從事簿記、監督與排版職務。此外，Chun Ayin 尚獨自掌管「中文部」(Chinese department)。這份職員名單透露 Chun Ayin 為館內唯一一名華人記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從事日記翻譯的人。

查閱現有研究可知，Chun Ayin 即清末報業家與外交官「陳言」。陳言，號藹廷，1871 年受聘為《德臣西報》副主筆兼翻譯員，曾負責報社中文報紙《中外新聞七日報》編輯工作與《華字日報》的創辦事務。1878 年，陳言應駐美、西、秘三國公使陳蘭彬 (1816–1895) 邀請，隨同出使而辭離報館。⁵⁴ 陳言因創辦香港第二份中文報紙《華字日報》而為人稱道。縱觀陳言七年的報社生涯，有一件事頗具傳奇色彩：1874 年，他追蹤報導日本進兵臺灣，因曝露清廷軍機處密諭而險遭通緝。⁵⁵ 陳言能獲取常人難以染指的密報，反映他有特殊的消息渠道。《德臣西報》披露了僅在清吏間流傳的禁燬細節，且定期刊譯日記條目，這些工作的背後推手，非陳言莫屬。

至於日記連載計畫擱置，與譯者離職無關。陳言 1878 年 3 月 23 日才正式離開報社。⁵⁶ 他之所以在 1878 年 1 月中止英譯，是由於上海《字林西報》已搶先翻譯具有爭議性的日記條目。這使陳言的連載計畫，成為一件食之無味的工作。一項有力的證據是，1878 年 1 月 7 日，《德臣西報》轉載《字林西報》關於郭嵩燾外交觀念的譯文後再無更新。⁵⁷ 事實上，《字林西報》於 1877 年 12 月底已刊印了一則有關郭嵩燾對教案看法的譯文。這則日記也是《德臣西報》未嘗披露的，並很快被港報《孖刺西報》轉載。這不可能不引起陳言的注意。⁵⁸ 《德臣西報》最終以刊登 1878 年 1 月 7 日的譯文作

⁵⁴ 陳言與王韜 (1828–1897)、伍廷芳 (1842–1922) 等香港早期報人亦有交往合作，伍廷芳八十年代後亦投身中國外交政壇。關於陳言早年的報業活動，詳見陳鳴：《香港報業史稿，1844–1911》(香港：華光報業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00–103；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增訂本)，頁 153–78、213–36；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s.,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8–69; Elizabeth Sinn and Christopher Munn, eds., *Meeting Place: Encounters across Culture in Hong Kong, 1841–198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7–22；此外，陳言曾同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歐德理 (Ernst Eitel, 1838–1908) 磋商購買倫敦傳教會的中文鉛字，詳見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頁 253、303–4；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Victoria, BC: Friesen Press, 2016), pp. 497–503。

⁵⁵ 詳見朱瑪瓏：〈外交情報與港際報業：以 1874 年臺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3 期 (2016 年 9 月)，頁 26–32。

⁵⁶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344 (1 April 1878), p. 2.

⁵⁷ *The China Mail* 34, no. 4529 (7 January 1878), p. 3.

⁵⁸ “KWOH SUNG-TAO ON THE ’XTIAN PROPAGANDA,”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0, no. 4172 (28 December 1877), p. 611; “KWOH SUNG-TAO ON THE CHRISTAN PROPAGANDA,”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270 (3 January 1878), p. 2.

結，似乎暗示致使日記禁燬的條目已被刊譯，報社僅需轉載即可，毋庸畫蛇添足，再次翻譯。然而，與《德臣西報》立足於揭露燬版真相不同，《字林西報》的譯文是為了澄清燬版流言。

五、開啟報導爭議的上海譯本

《孖刺西報》的報導很快引起上海英報《華洋通聞》(*The Celestial Empire*)與《字林西報》的關注。⁵⁹《華洋通聞》於1877年12月27日全文轉載《孖刺西報》的燬版報導。⁶⁰《字林西報》不單止轉載報導，更發表評論，並先後翻譯了郭嵩燾日記中的兩則為佐證。

《字林西報》首則評論稱，日記被禁燬一事尚待確認，「但是我們確知這本日記的第一部分即記述歐洲旅途之事，已於春季獲總理衙門刊印，以分發中國各省衙門。本報得以在另一欄目，提供讀者可能感興趣的日記摘要」。⁶¹《字林西報》評論所說的「日記摘要」，是郭嵩燾日記關於處理教案的譯文。評論者大體肯定郭嵩燾在中國主張寬容對待宗教。此外，評論也聯繫清廷年初發佈，提倡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平權的法令，進而推測這項法令在使團出發前已獲籌議。評論最後總結：「正如我們之前所言，我們不相信中國人會不寬容；如果能找到一種方式平息因傳教而頻頻引起的衝突，外國人會同中國人一樣感到欣慰。」⁶²評論雖稱禁燬之事尚待查證，但是從其立論可知，他更傾向於認為此事為子虛烏有。報社之所以大篇幅翻譯郭嵩燾關於教案的意見，是為了證明郭氏的見解與清廷法令如出一轍，日記禁燬自成無稽之談。

《字林西報》第二則報導為譯評郭嵩燾外交觀念的日記條目。《德臣西報》其後轉引這則日記，作為英譯計畫的總結。《字林西報》譯文前的評論，反映報社的翻譯與解讀立場。評論稱，郭嵩燾關於中西關係的創見未必不準確。郭嵩燾雖然不通外文，不得不依賴三十年前徐繼畲(1795–1873)刊刻的《瀛環志略》，但是「他顯然已盡其所能地利用機會，諮詢身邊的歐洲人。此外，他也樂意利用各種時機，接觸英國

⁵⁹ 《華洋通聞》1874年創刊，1911年停刊，其創辦宗旨、主編人員以及報系分支等詳情，參見 Frank H. H. King and Prescott Clarke, eds.,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pp. 29–31, 84–89, 112, 115, 134, 179。

⁶⁰ 《華洋通聞》的報導至今尚未電子化，本文援引的資料均據大英圖書館的報紙膠卷，*The Celestial Empire* 9 (27 December 1877), p. 594。

⁶¹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0, no. 4172 (28 December 1877), p. 611: “But we do know that the first section of it, describing the voyage to Europe, was printed in the Spring by the Tsung-li-yamên, presumably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provinces; and we are able to give, in another column, a translation of an extract which may interest our readers.”

⁶² *Ibid.*: “As we said before,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are inclined at heart to be intolerant; and foreigners will be as pleased as the Chinese themselves, if a way can be found to obviate the irritation which the Christian propaganda does at times excite.”

殖民地與軍職管理模式，從中汲取經驗」。⁶³這則評論亦推測日記與政局兩者之間的聯繫，稱「他譴責空談愛國的行為，極可能嘗試婉轉提醒那些將會加入空談行列的外交部新同事」。⁶⁴評論者發佈這條譯文，旨在指出郭嵩燾批評清廷因襲宋明空談之風，藉以表明自己開明的外交觀念。

1878年2月14日，字林報社改變立場，公開譴責日記燬版。據筆者目前收集的資料顯示，同位於上海的《華洋通聞》早於1878年1月17日刊載長篇社論，講述燬版始末，並全文轉載《德臣西報》的譯文。報導前後共佔兩個版面的篇幅。⁶⁵相較這種大張旗鼓的舉動，《字林西報》的處理方式可謂異常低調。這家報社在周刊《北華捷報》「1877回顧」欄目中稱，本年度唯一值得談論之事為郭嵩燾赴英謁見女王，並呈交中國皇帝的致歉信。然而，這則回顧未詳述郭氏謁見女王細節，反而筆鋒一轉，述及燬版之事，「但據說一名審查人員已經介入，抗議這本冊子傾向犧牲中國來吹捧外國，應加禁絕」。⁶⁶論者譴責此事「進一步證實了中國文人學士的盲目自負」，稱郭嵩燾講述的事實將會在他回國後重新影響本國同胞。⁶⁷《北華捷報》每周均會結集日報《字林西報》一個星期的新聞要點。在日報上刊登的譯文與評論，一律重刊於《北華捷報》。⁶⁸這則僅見於《北華捷報》的年度回顧，無疑是為了更正先前失誤的報導。那麼，是誰在背後主持這些工作呢？

據前所引《中國、日本與菲律賓年鑑指南》紀錄，這家名為「字林」的公司位於上海漢口路七號，業務為編製出版日報《字林西報》與周報《北華捷報》。公司為 J. Broadhurst Tootal 的產業，職員有正副主編 R. S. Gundry 與 G. W. Haden 兩人，記者 J. G. Thirkell 一人，擔任會計、文員、印刷經理等人員十一人。⁶⁹這家報社未聘請華

⁶³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1, no. 4177 (4 January 1878), p. 11: “. . . he has evidently employed his opportunities of questioning the Europeans about him to the best advantage, in addition to which he has enjoyed ample occasions of gaining an insight into the methods of English administration in the different colonies and military posts at which he touched en route.”

⁶⁴ *Ibid.*: “His condemnation of the ‘empty vapouring’ of Chinese patriotism may very possibly be intended as a gentle hint to his late colleagues i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hose talents he doubtless knows to be chiefly developed in that direction.”

⁶⁵ *The Celestial Empire* 10 (17 January 1878), pp. 50, 64–65.

⁶⁶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20, no. 561 (14 February 1878), p. 149: “But a Censor is said to have stepped in with a remonstrance that the whole tendency of the pamphlet was to exalt foreign nations at the expense of China; and to have procured its seclusion.”

⁶⁷ *Ibid.*: “. . . and a further confirmation, if such were wanted, of the wilful conceit and blindness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⁶⁸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20, no. 555 (3 January 1878), p. 6; 20, no. 556 (10 January 1878), p. 36.

⁶⁹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Year 1877*, p. 306.

人，僅憑職員名單，無法確知編輯與記者的分工情況。字林公司出版的另一份文獻《中國政治與商業大事回顧：1873至1877年五年間》(*A Re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in China: During the Five Years 1873–1877*)，有助於撥開這個謎團。字林公司1873年開始整理新聞要點，此前已結集出版1868至1872年份的新聞資料。《中國政治與商業大事回顧》延續以往的分類，將新聞回顧分為「政治」與「商業」兩部分。不同的是，這部書註明編者為 R. S. Gundry，且提及報社分工情況。書序稱：「與前一部書相同，這些政論文章均出自主編之手。他意識到這些文章有許多不足之處。一個原因是，這些文章並非基於某項研究之下而作的精密闡述，無意寫成信史。相反，這些文章原為新聞出版而作，僅簡單記述了每年發生的大事。」⁷⁰此書的政論部分也收錄了燬版事件的年度回顧，其作者無疑就是主編 Gundry 本人。⁷¹

R. S. Gundry 全名 Richard Simpson Gundry，中文名作「蓋德潤」，曾以英國《泰晤士報》通訊員的身分派駐印度，1865至1878年轉任上海字林報社主編。蓋德潤擔任主編十年，把報社由商業報導調整為政治時評，同時改組日報《字林西報》與周刊《北華捷報》。⁷²除了供職於上海報館，蓋德潤同時兼任英國《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1878年，蓋德潤於《泰晤士報》刊登兩封信函，披露日記燬版的後續細節。⁷³

蓋德潤首封通信刊登於1878年5月8日《泰晤士報》。這通信件可與上海《字林西報》在同年3月28日刊登的匿名報導參看。這兩則新聞均稱劉錫鴻暗中指使，參奏燬版。此外，兩報並稱郭嵩燾出使前撰寫的排外報告已經刊行，以消除出使日記過於

⁷⁰ R. S. Gundry, ed., *A Re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in China: During the Five Years 1873 to 1877*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78), pp. 1–3: “The Political articles are, as in the former volume, solely from the pen of the Editor, who is conscious that many defects can be charged against them. The excuse is that they do not pretend to be standard history, thoughtfully elaborated in the calm of a study, but simply retrospective sketches of each year’s events, written originally for publication in a newspaper.”

⁷¹ Ibid., pp. 79–80.

⁷² 蓋德潤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兩本著作《中國及其鄰邦》(*China and Her Neighbours*)與《中國現狀及過去》(*China Present and Past*)顯示出他熟稔中國政局，兩書至今仍為重要的學術參考文獻。他的生平可參見《北華捷報》與《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辭典》誤將包羅傑 (Demetrius Boulger, 1853–1928) 所著的《馬格里爵士傳》(*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歸於蓋德潤名下，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83–84；*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20, no. 576 (1 June 1878), p. 558; 176, no. 3287 (5 August 1930), pp. 5–8。蓋德潤個人檔案極為少為學界留意。這批檔案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收錄他的信件與文章。可惜筆者檢閱這筆檔案時未能從中尋得相關線索。

⁷³ 蓋德潤1878年3月21日與8月20日先後向《泰晤士報》寄發兩封通信。需補充的是，蓋德潤僅第二封通信署名為 R. S. G.，而第一封通信只注明上海通訊員的身分。由於蓋德潤在第二封通信提到3月21日的通信為本人所寫，故筆者判斷兩信作者為同一人。詳閱 *The Times*, no. 29249 (8 May 1878), p. 5; no. 29341 (23 August 1878), p. 10。

親外的不良影響。值得關注的是，兩報報導內容相似之外，用詞、敘述更是如出一轍。例如，《字林西報》稱“The denunciation is commonly reported to have been prompted by Liu, the late colleague of Kwoh, and now Minister to Germany”，《泰晤士報》的報導僅多了“I now hear that”，其他文字，全然一致。⁷⁴不同的是，蓋德潤在通信中表達了更多的個人見解，他斷定郭嵩燾在出使英國前實為保守派官員，出使後才改變陳見。此外，通信透露郭嵩燾懼怕劉錫鴻告發他崇洋媚外，請求辭職回國。蓋德潤的通信刊載於5月8日，晚於《字林西報》月餘。不過，通信寄發的日期是3月21日，寫作時日早於《字林西報》報導刊登的時間一周。據此推斷，《字林西報》3月28日刊登的匿名報導應出自蓋德潤之手，其中雷同的語句應摘錄自寄往《泰晤士報》的通信。這也證實蓋德潤宣稱負責《字林西報》的政治時評並非虛言。

《泰晤士報》這封通信促使寓居倫敦的郭嵩燾公開回應。⁷⁵一封署名“H. M.”即郭嵩燾的譯員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的澄清信，於1878年5月28日刊登在《泰晤士報》上。⁷⁶這封信稱郭嵩燾出使前未寫作類似的排外報告，請求辭職也非懼憚反對勢力等。此外，這封信辯稱《使西紀程》為赴歐途中所寫，據以分析郭嵩燾受歐洲文明的影響，為時過早。「這本日記，作為證據而言，只可視為公使來英前抱持的觀念，而非他駐英後的觀點」。⁷⁷另外，禁煙協會主辦的《中國之友》(*The*

⁷⁴ *The Times*, no. 29249 (8 May 1878), p. 5;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1, no. 4246 (28 March 1878), p. 287.

⁷⁵ 郭嵩燾十分關注英國的新聞報導，曾囑託馬格里訂購《泰晤士報》、《每日新聞》(*The Daily News*)、《旗幟報》(*The Standard*)與《晨郵報》等四種報紙，並安排使館譯員翻譯。此外，駐英副使劉錫鴻的日記亦記錄，伍廷芳曾向駐英使團建議及時澄清外文報刊的不實報導：「此間乏中國人，遇有交涉案件，惟憑彼商一面之詞，……今遣使駐筭以通氣，誠中肯綮。然猶須多蓄才智人，效為洋語，散布此地，並刊傳新聞紙，以持其曲直，乃有濟也。」參見劉錫鴻：《英軺日記》，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上海：著易堂，1891年)，第十一帙，頁一六六下；《郭嵩燾全集》，第10冊，頁92。

⁷⁶ 《郭嵩燾日記》與《馬格里爵士傳》僅有片言隻語記錄此事，《郭嵩燾先生年譜》亦只提及撰寫通信者應為馬格里在華舊交，但未細考其姓名。據查證，蓋德潤與馬格里確為舊識，《馬格里爵士傳》收錄了馬格里分別於1870年、1876年致蓋德潤的通信，可以為證。兩人此後保持通信，劍橋大學館藏檔案中亦存四封馬格里致蓋德潤的信件，參見《郭嵩燾先生年譜》，頁759–60；《郭嵩燾全集》，第10冊，頁483；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08), pp. 181–82, 252–56, 291–93; Manuscripts/MS Add.9269/Richard Simpson Gundry: Correspondence and Papers, “Macartney to Gundry” (30 June 1887), (23 May 1888); (14 November 1891), (26 February 1894)。

⁷⁷ H. M., “THE CHINESE MINIS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no. 29262 (23 May 1878), p. 10: “The diary must, therefore, be taken as affording evidence only of such opinions as the Minister had entertained before coming to England, not of those which he may have formed in consequence.”

Friend of China) 在6月亦發文指《泰晤士報》評論失實，辯稱郭嵩燾是「進步與自由觀念的支持者」，並提示讀者去閱讀一名資深漢學家已翻譯出版的郭嵩燾日記。⁷⁸

針對郭嵩燾的辯護，蓋德潤又在1878年8月20日向《泰晤士報》發信回應。⁷⁹他修正5月8日的推測，稱「我極有理由相信，公使對於英國各類機構的評價，具有卓著的見識。他了解西方文明的優勝之處，並坦率地傳達給北京」。⁸⁰蓋德潤信中還提到，保守派反對郭嵩燾觀點的理由是這些西式器物「從未見於孔子時代」。⁸¹此後，蓋德潤再沒有發表後續報導，為期近一年的訪查，才算真正完結。⁸²蓋德潤與郭嵩燾的書信討論，先後為倫敦、香港報刊轉載。⁸³

《字林西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英報，營運得益於報社穩定而豐富的稿源。綜合蓋德潤負責政治時評與熱衷燬版調查兩方面來看，在《字林西報》發表的日記評論，應出自蓋德潤之手；為辯護而引用的譯文，亦應在他主持之下完成。上海譯本流佈甚廣，上海與香港兩地以外，印度、澳大利亞、英國與美國等報刊，均先後轉載。⁸⁴關於郭嵩燾外交觀念的譯文是報導的核心，為立場迥異的報刊頻繁刊印。一個明顯例子是《孖刺西報》的後續報導。這份港報於1878年1月8日及17日重複刊登上海譯本後一則譯文，並發表頭條社論，「查禁郭嵩燾日記為愚蠢之舉，反倒讓這本日記更

⁷⁸ 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 ed., "THE CHINESE MINISTER," *The Friend of China*, no. 11 (June 1878), pp. 176–77: "... is now a friend of progress and liberal ideas."

⁷⁹ 值得一提的是，蓋德潤的第二封通信是他拜訪郭嵩燾後所寫的。蓋德潤1878年8月8日在倫敦向郭嵩燾透露劉錫鴻與國內的聯繫。郭嵩燾記其名為「庚得里」：「《字林日報》總辦庚得里來見，述梅輝立之言，謂劉雲生遍致京師貴人信以相傾，京師物論似左袒劉生，引以為憾。」可知，蓋德潤前一封通信的消息來源是英國駐京外交官梅輝立，《字林西報》此前確認燬版事極可能也得自梅輝立的轉告，參見《郭嵩燾全集》，第10冊，頁571。

⁸⁰ R. S. G., "CHINESE POLICY.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no. 29341 (23 August 1878), p. 10: "... I have the best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is Excellency's comments upon English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niformly discerning and favourable. He has appreciated the superior conditi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has frankly transmitted his views to Peking." *Ibid.*: "... that did not exist in the days of Confucius. ..."

⁸¹ 第二封來信落款地址為倫敦聖詹姆斯街(St. James's Street)的俱樂部Thatched-house Club。可見蓋德潤已離職返回倫敦，此時他已不負責編審《字林西報》。

⁸² *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 20 (27 May 1878), pp. 472–73;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422 (2 July 1878), p. 2.

⁸³ 筆者已見報紙有：《印度泰晤士報》、《帕爾默爾報》、《世俗紀事》、《悉尼先驅晨報》，依次見 *The Times of India* 41, no. 15 (17 January 1878), p. 3; 41, no. 20 (23 January 1878), p. 3; *The Pall Mall Gazette* 27, no. 4055 (18 February 1878), p. 665; *The Secular Chronicle* 9, no. 9 (3 March 1878), p. 102;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77, no. 12497 (8 June 1878), p. 6。

易在外國刊物出版」，中國亟需駐英公使那樣敢於如實指出國家不足的政治家。⁸⁵譯文則被援引以證實晚清排外的政局氣候。《孖刺西報》的批判立場與蓋德潤半年後的追蹤結論一樣，將燬版歸因為保守勢力囿於「華夷之辨」，無法容忍郭嵩燾在公務日記中的直言。

六、「直言」抑或「侈言」？

上海譯本後一則譯文源自《使西紀程》1877年1月19日條，即郭嵩燾抵英兩日前的紀錄。這則日記的譯文亦見倫敦譯本。艾約瑟的譯本極少逐字照譯，但此則日記以能呈現郭嵩燾的外交觀念而幾乎全譯，其後譯者及研究者也加以重複援引。本文為方便舉證分析，不避其繁，羅列相關條目如下，並用括號與曲線分別標示兩個譯本的選譯之處：

雨，風。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一分，經度距倫敦偏西至九度五十二分。出大西洋折而北，稍透東行，至是益東。【西洋以智力相勝，垂二千年。麥西、羅馬、麥加迭為盛衰，而建國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而俄羅斯盡北漠之地，由興安嶺出黑龍江，悉括其東北地以達松花江，與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極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諸部，盡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設重兵駐之。比地度力，足稱二霸。而環中國逼處以相窺伺，高掌遠蹠，鷹揚虎視，以日廓其富強之基，而絕不一逞兵縱暴，以掠奪之心。其構兵中國，猶展轉據理爭辨，持重而後發。此豈中國高談闊論，虛驕以自張大時哉？】輕重緩急，無足深論。【而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

【班固〈匈奴傳〉贊有曰：「來則以禮接之，畔則以兵威之，而常使曲在彼。」處爭奪尤然，況其所挾持者尤大而其謀尤深者乎！】劉雲生自謂能處洋務，至是亦自證其所知之淺，而曰處今日之勢，惟有傾誠以與各國相接，捨是無能自立者。【鄙人為時詬病多矣，姚彥嘉謬以為學識過人，吾何足言學識哉？宋、明史冊具在，世人心思耳目為數百年虛驕之議論所奪，不一考求其事實耳。】往聞何願船談洋務深中竅要，怪而問之，答曰：「六經周秦古書，下逮儒先

⁸⁵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274 (8 January 1878), p. 2; "CHINESE EMBASSIES ABROAD,"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no. 6282 (17 January 1878), p. 2: "The folly of the suppression of His Excellency KWOH SUNG-TAO's diary is now made manifest by its publication in foreign journals"

論著，准以歷代之史，參考互證，顯然明白。世俗議論，只自豪耳，何足為據！」此之謂學識。⁸⁶

⁸⁶ 鍾叔河、楊堅最早整理郭嵩燾日記，曾羅列日記底本、《使西紀程》底稿和刊本三者之間的區別。為了避免重複研究，本文關於日記刊本與底本的引用即取自前人的成果，詳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90-91。上海譯本見“KWO SUNG-TAO ON THE POLITICAL POSITIO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21, no. 4177 (4 January 1878), p. 11:

As the steamer bearing the Mission approached the entrance to the English Channel, H.E. Kwo devotes several pages of his journal to a review of the present importance of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Judaism, Romanism, Islamism,” he observes, “have flourished or decayed, but States have endured unchanged. In recent times, Great Britain, France,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ermany have raised themselves to a commanding position of influence and power. They have introduced th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vi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homage they pay to truth and justice. The utmost importance is attached in their opinion to the comity of nations. Mutual regard is shewn among them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courtesy has attained to its fullest development. They have secured in this respect both substance and form. These nations both substance and form. These nations are advanced, to an immeasurable degree, beyond the condi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ingdoms of Chinese antiquity.”— The Envoy then proceeds to descant upon the surpassing extent and power of the British and the Russian Empires, the one extending its dominions along the entire expanse of Northern Asia, through the deserts of the North to the mouth of the Amoor and to the borders of Japan, whilst England has traversed the Mediterranean Sea to become mistress of India, gathering into her lap all the wealth of the Southern Ocean, and planting everywhere colonies and garrisons such as are to be seen at Hongkong. These two Empires, he observes, “by the extent of their territory and the degree of their power, are well entitled to be designated the two monarchs of the world. They hold China, as it were, in their embrace, each watchful of the other, each with hand upraised and firmly planted tread, or (to change the metaphor), hovering like the falcon and glaring tiger like. Each daily augments the wealth and extent of its dominions, yet on neither side is the rein given to hostile undertakings, nor are designs of predatory enterprise allowed to have free play. When a question of war against China may arise, they will dwell long in contention up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and advance only when the matter has been gravely weighed. Shall any one pretend that the present is a time for China to puff herself up with vainglorious boasts and empty vapouring? There is no need to spend time in considerations of theoretical advantage, relatively weighted;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it is plain, have not organized themselves as they have done, without a system. Let but this be rightly laid hold of, and each contributes to the other’s wealth and power,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may be assured for a thousand years. If the system be not laid of, ruin must ensue. My colleague Liu has hitherto piqued himself upon knowing how to deal with the affairs of foreigners, but he has come now to confess to himself the shallowness of his view.”— The Envoy proceeds to condemn the ineptitude of those whose idea of foreign relations is inspired by the mistaken patriotism of the writers of the Sung and Ming dynasties, when hatred of the outsider was highest type of Chinese loyalty.— The diary end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Mission at its home in Portland Place.

〔上接頁139〕

倫敦譯本見“DIARY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 VOYAGE TO EUROPE,” in James Macaulay and William Stevens, eds., *The Leisure Hour*, no. 1347 (October 1877), pp. 662–63:

The Western nations have struggled with each other, each conquering the rest by superior political wisdom,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Egypt, Rome, and Mecca have had their turns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e, but the Western nations are strong as before. Of late, England, France,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have risen to power and positi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established. Justice and fidelity to engagements are made the basis of intercourse. Peace between nations is sought for as leading to friendship. To the real sentiment of kindness is added a polished ceremonial, to indicate mutual respect. This is a much better state of things than existed in China at the time of which Confucius wrote the history.

Russia has extended her territory all along the desert of Gobi, on its extreme edge, to the Amoor, and now possesses the whole of the land to the east and north of that river. The Sungari is now one of her boundaries, and Japan one of her neighbours.

England, in the extreme west, having the Mediterranean Sea as a path of communication,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India, has acquired all the wealth of the Southern Sea (south of Asia). Founding a colony in Hong Kong, she has placed there a strong military force to retain it in security.

As to territory and as to strength, these two countries may be called two mighty powers which press China on all sides, and are on the watch, with arm lifted high and foot stretched out far, like the eagle in its flight and like the tiger in its glance, eagerly waiting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the limits of their wealth and power. And they do not send armies and use violence only with a view to plunder. In entering on a war with China, they will meditate deeply, hold strongly to right, discuss perseveringly, carefully investigate, and then act.

“Is this a time for China to be boastful and arrogant?”

The diarist declines to go further into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situation. He merely says that the Western kingdoms have their beginning and end, like other nations. If the true policy to be adopted in reference to them be understood, they will aid China to become rich and great, and she may retain her independence for a thousand years to come. If the opposite policy is adopted, results of an opposite kind may be expected to take place. “If,” he adds, “2,000 years ago the historian Pankoo laid it down as a principl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Tartar empire in China of that day, ‘to receive them when they come with respectful civility, and to awe them when they rebel with a display of military power, always remembering that a crooked policy will fail to check their plundering raids,’ how much more should China now, when the danger is greater, and the schemes of the enemy more subtle, be animated by a desire to exercise similar prudence!” The writer states, in conclusion, that he has had to endure many calumnious charges, but his appeal is to the history of his country, which shows convincingly, by facts belonging to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at the policy the ambassador recommends is the true policy to be pursued.

引文用括號標記的四處則為艾約瑟所選譯，前三處為直譯，後一處為意譯。艾約瑟熟稔中國經史，他的翻譯不避郭嵩燾援引典籍的論述。曲線標記之處為上海《字林西報》翻譯的片段，譯文未及郭嵩燾引經據典的文字，其他內容則僅比倫敦譯本多了述及劉錫鴻談論洋務的語句。總體而言，兩個譯本的譯文，沒有刻意刪減原文重要的語句。中英文讀者閱讀的內容，沒有太大差別。

然而，燬版消息曝光後，「華夷之辨」卻成為西人解釋日記燬版的依據。《使西紀程》的最早譯者艾約瑟於1878年4月評述《瀛海論》時，順帶表達了他的態度。艾約瑟不滿《瀛海論》採用西學中源說譯介西方科學，指這種寫作方式，保留了中國知識的優越地位，與過去用「蠻夷」(barbarians or devils)稱呼外國人無本質區別。⁸⁷他稱：「更值得憧憬的是，中國駐英公使回國後應該教授一種更好的寫作方式，為了真相，敢於呈現事物原貌而不惜遭受唾棄。」⁸⁸艾約瑟這種說法，表示他認為郭嵩燾因採用「直言」的寫作方式而激起公憤。與艾約瑟略有不同，蓋德潤將燬版歸咎於保守派的打擊，《孖刺西報》、《德臣西報》與《華洋通聞》等社論，亦將矛頭直指保守官員，認為郭嵩燾如實講述了華夷心態無法容忍的真相。然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歷經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官員是否依舊將西方強國視作蠻夷之鄉？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廷引進西方軍事工藝，培養專業涉外人員，又贊助出版一批以法律、史地、科技等為主題的西方書籍，為清朝官員處理涉外事務提供新的知識。史地知識方面，原先備受謗議的《瀛環志略》(1849)於1866年獲總理衙門題序重印，成為京師同文館的教科書，以及出洋使團參考書。⁸⁹徐繼畲在書中詳述西方政治體制，推崇美國為「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的理想國度，⁹⁰較郭嵩燾更為推許美國。⁹¹國際法律知識方面，清廷贊助翻譯的《萬國公法》(1864)，在未正式印行

⁸⁷ Edkins, "PEKING LETTER," pp. 38–39.

⁸⁸ Ibid., p. 39: "It is much to be desired that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England should, on his return to his country, teach a better method and risk for the sake of truth the great unpopularity to which he would be subjected for daring to represent things as they are."

⁸⁹ 任復興(編):《徐繼畲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96–99。《瀛環志略》的研究專著有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⁹⁰ 《瀛環志略》稱:「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仍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見徐繼畲:《瀛環志略》(北京:總理衙門藏版,1866年),卷九,頁十六上。

⁹¹ 徐繼畲的紀錄依據為美國首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這本漢文西書以美國的政治歷史為主要內容,於1838年由新加坡堅夏書院刊印,1844年修訂並改名為《亞墨理格合眾國志略》在香港出版,1861年再次修訂並改名為《大美聯邦志略》由上海墨海書館出版。除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外,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與梁廷枏(1796–1861)的《海國四說》也大量採用裨治文著作的內容,也在序言中表達了稱羨美國之意,詳閱張施娟:《裨治文與早期中美文化交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5–85。

前已實際據以處理涉外政務。⁹²該書於1864年印製三百部發送通商口岸，次年更定為京師同文館教科書。⁹³張斯桂《萬國公法》序言稱：「此外諸國，一春秋時大列國也。若英吉利，若法郎西，若俄羅斯，若美利堅之四國，強則強矣，要非生而強也。」並簡述四國崛起歷程。⁹⁴這兩部官方贊助的圖書，均稱羨西洋，足以說明清廷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未囿於華夷之見，開始正視西方諸國的挑戰。

主張禁燬日記的何金壽在奏摺中稱「中外情形，人人所知，但在努力自強，無待反覆多論」，也未貶抑西方的強盛。⁹⁵值得關注的是，與英報將燬版歸因於郭嵩燾「直言」不同，何金壽認為《使西紀程》誇大、取媚，並援引兩則日記為據。筆者現將有關文字截錄如下：

竊臣近見兵部侍郎郭嵩燾所撰《使西紀程》一書，侈言俄、英諸國富強，禮義信讓，文字之美；又謂該國足稱二霸，高掌遠蹠，鷹揚虎視，猶復持重而後發，不似中國虛驕自張。一再稱揚，種種取媚，喪心失體，已堪駭異。其中尤謬者，至謂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與遼、金崛起情形絕異，逼處憑陵，智力兼勝，並不得以和論等語。⁹⁶

曲線標記處見於1877年1月19日的刊本日記，為英譯本重點擇譯；直線標記處見於1876年12月22日的刊本日記，強調西洋諸國與遼、金兩國不同，規戒清廷不應沿襲宋儒應對策略。⁹⁷奏摺援引的這兩則日記內容雖各有偏重，但觀點大體一致。如前文所述，清廷雖未公開何金壽的奏摺，但其中抨擊郭嵩燾《使西紀程》的文字，卻在清吏間流傳。⁹⁸遠在倫敦的郭嵩燾獲悉燬版事後，⁹⁹曾就1876年12月22日日記中「以和

⁹² 田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年），頁57-59；傅德元：《丁韞良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頁242-43。

⁹³ 王爾敏：《弱國外交：面對列強環伺的晚清世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85-87。

⁹⁴ 惠頓（編撰）、丁韞良（譯）：《萬國公法》（北京：京都崇實館存板，1864年），〈序〉。

⁹⁵ 奏摺原文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錄副奏摺」，轉引自楊錫貴：〈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被參五摺析〉，《文史博覽（理論）》2012年第11期，頁8。

⁹⁶ 楊錫貴：〈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被參五摺析〉，頁8。

⁹⁷ 詳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66-67。

⁹⁸ 除註解17中李鴻章轉述周家楣函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慈銘1877年7月28日抄評《使西紀程》的紀錄。他的抄評提及何金壽之奏摺，且抄錄的兩則日記與何金壽枚舉之處一致，應為附和何金壽而作。不同的是，李慈銘擴大抨擊對象，直指總理衙門決策失當，稱「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為之刊行，……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郭嵩燾於1877年10月12日作〈辦理洋務橫被構陷瀝情上陳疏〉，亦稱「錄呈總理衙門，實屬規國之要義，為臣職所當為。同文館檢字刷印，借以傳示考求洋務者，固非臣所及知」。詳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0冊，頁7453-56；《郭嵩燾全集》，第4冊，頁833。

⁹⁹ 張斯桂之外，李鴻章於1877年11月8日亦函告郭嵩燾燬版事：「執事日記一編，初聞蘭孫〔下轉頁143〕

論」上疏爭辯。¹⁰⁰不過，隨著史料的整理利用，有論者留意到《使西紀程》不僅為政治立場相異的官員排斥，同時也不為一些頗具遠見的洋務官員接受。¹⁰¹本文認為除了立場之爭，亦需從清吏認知限度來重審《使西紀程》的可議之處。何金壽在奏摺中指責日記稱頌英俄兩國為取媚行為，質疑郭嵩燾關於西洋立國之見與應對西洋的辦法。誠然，作為遊歷紀實著作，《使西紀程》以赴英途中五十一天的見聞，論述西洋立國二千年，不免有誇大之嫌。¹⁰²至於郭嵩燾鋪陳英俄兩國爭霸局面，為何被譏諷為失實取媚？

若以「據實直言」的標準衡量，郭嵩燾日記講述英俄爭霸，實有重重疑點。郭嵩燾途經香港、新加坡、錫蘭等英屬殖民地，因而論及英國富強，足以稱霸，尚有根

〔上接頁142〕

大為不平，逢人詆譏，何君乃逢迎李、景，發言盈庭，總署懼而燬版，謗者遂亦中止。何疏未見底稿，究不知其詳，悠悠之口，奚足深論。」蘭孫即總理衙門大臣李鴻藻（1820—1897），景指總理衙門大臣景廉（1823—1885），李鴻章僅聞參奏一事，未詳證當中細節真偽。郭嵩燾則認為何金壽、劉錫鴻等人之參皆為李鴻藻暗中指使，此見已有學者質疑，茲不贅述。詳見《李鴻章全集》，第32冊，頁152—53；《郭嵩燾全集》，第13冊，頁293、305、321；王維江：〈郭嵩燾與劉錫鴻〉，《學術月刊》1995年第4期，頁79—80；張宇權：《思想與時代的落差：晚清外交官劉錫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59、173—75。

¹⁰⁰ 前引奏摺〈辦理洋務橫被構陷瀝情上陳疏〉有云：「聞所據為罪狀者，在指摘日記中『並不得以和論』一語。竊查西洋通商已歷一千四百餘年，與歷代匈奴、鮮卑、突厥、契丹為害中國，情形絕異，始終不越通商之局。國家當一力講求應接之術，戰、守、和三者俱無足言，而仍以自求富強為之本。臣此言實屢見之論奏，不自日記始。」郭嵩燾辯稱「不得以和論」並非新語，他出使前的奏摺已具論。郭嵩燾赴英前補陳的〈擬銷假論洋務疏〉確有此論，詳見《郭嵩燾全集》，第4冊，頁791—96、833。

¹⁰¹ 值得一提的是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福成的態度轉變。薛福成同情郭嵩燾屢遭清議詆譏的處境，1889年出使後亦有意向清廷推薦《使西紀程》一書。不過，他此前一度認為郭嵩燾介紹西方富強之言過當，其中日記1890年5月1日亦有文字追憶：「昔郭筠仙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蕤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此次來遊歐洲，由巴黎至倫敦，始信侍郎之說，當於議院、學堂、監獄、醫院徵之。」陳荔秋即晚清首任駐美國、西班牙與秘魯三國公使陳蘭彬，黎蕤齋即首任駐英參贊黎庶昌（1837—1898），兩人均有出洋經歷，故薛福成詢問二人以證郭嵩燾之言。關於薛福成對郭嵩燾的評價，可參見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頁538、730、826；《郭嵩燾全集》，第13冊，頁460；楊堅：〈關於郭嵩燾日記〉，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2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25；吳寶暉：《初出國門》，頁85；蕭國敏：〈《西洋雜誌》的編撰學：晚清士大夫首次走向西洋的集體敘述〉，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輯刊》第一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257—58；秦暉：《走出帝制：從晚晴到民國的歷史回望》（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頁71。

¹⁰² 郭嵩燾在〈辦理洋務橫被構陷瀝情上陳疏〉中亦曾交代日記取材來源，包括沿途見聞、隨員談論以及外洋新報三者，以說明記載皆有據可循。見《郭嵩燾全集》，第13冊，頁460。

據。然而，他未曾經過俄國，日記僅零星數言提及俄國。郭嵩燾謂俄國覬覦中國，依據何在？實際上，郭嵩燾原稿並未提及英俄爭霸之局，刊本這則條目實為郭嵩燾駐英後精心改寫而來。郭嵩燾日記原稿如下：

雨。午正行八百四十六里，在赤道北四十六度一分（倫敦西七度四十三分）。先夕過蓋潑非尼士特，遠見燈樓，洶湧倍甚。蓋西班牙向北盡處，地勢深入為佛蘭西，又邪伸而出，中成大蕩，寬廣千餘里。蓋潑者，譯言尖處也；非尼士，盡也；特者，地也。海浪至此，奔騰瀆激，舟行尤以為險。約歷十六時乃越此蕩，即為英、佛兩國對峙之海岸。一海茫茫，風雨晦冥，顛簸萬狀，而鬱熱加劇，蓋風兆也。西洋地氣，乃與中國東大海乖異如此。¹⁰³

對比本節開頭援引的刊本日記，可見郭嵩燾幾乎重寫原稿，僅保留首句關於航程與座標的紀錄。此外，他刪除了景色描寫，替換成議論英俄爭霸，乃至國際局勢的論述。郭嵩燾出使前已知俄國為患中國西北邊陲，但他認為「洋人之利在通商，無覬覦中國土地之心」，且「中國舉兵徵討，則亦坐視而不與爭。此其行之其漸，蓄之有其機，西洋各國皆然」，從未將俄國視作與英國匹敵之國。¹⁰⁴他赴英途中雖聽聞俄國政局情況，但也僅限於俄國涉足土耳其與憲政改革。¹⁰⁵那麼，郭嵩燾駐英之後，改寫日記的根據是甚麼呢？

郭嵩燾改寫的內容，實「逐譯」自林樂知的《中西關繫略論》。林樂知即前文所提，曾刊載《使西紀程》的美國傳教士。他的論著最早曾連載於他主辦的中文刊物《萬國公報》上，1876年由上海美華書館結集出版。結集版封面書名 *China and Her Neighbors: A Tract for the Times*，附英文目錄。標題下有小字“Designed to promote peace and encourage progress, by setting forth the motives and objects of foreigners in coming to China, and the spirit and manner in which the demands of the situation should be met b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說明這本書的撰寫目的是推廣和平與鼓勵進步，解說外國人來華動機以及清廷的應對策略。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林樂知檔案收藏一封信件，也提及這本書的寫作目的。信件是林樂知1880年4月向美國友人透露總理衙門計畫評註此書，並稱這本著作為服務中國官員而撰寫，主要探討「中外商業與政治關係，兼及傳教與穆斯林問題」。¹⁰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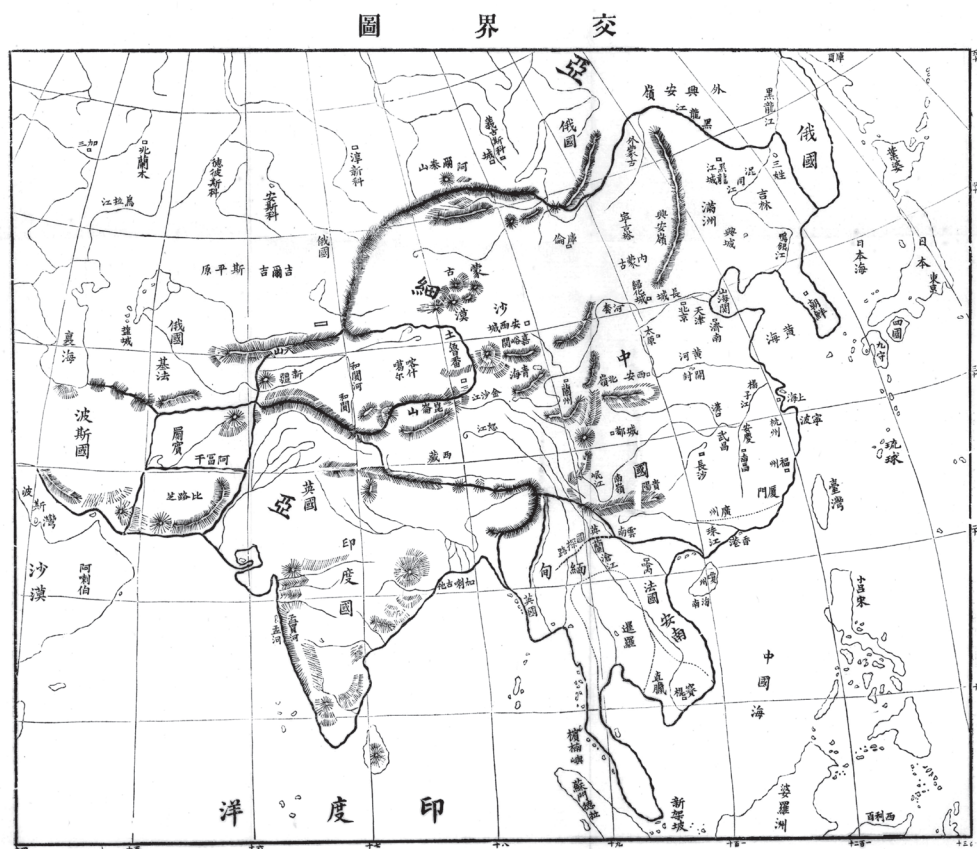
¹⁰³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90。

¹⁰⁴ 《郭嵩燾全集》，第4冊，頁781。

¹⁰⁵ 同上注，第10冊，頁83–86。

¹⁰⁶ Emory University, Manuscript Collection no. 11, Young John Allen Papers, 1854–1938, “Young John Allen to Dr. Wilson” (3 April 1880): “. . . the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of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Missionary and Mohammedian Questions.”

《中西關繫略論》共四卷，卷一論述中外交接事宜，卷二討論傳教與鴉片問題，卷三論述回教與喀什噶爾叛亂，卷四附錄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威妥瑪、曾國藩 (1811–1872) 等人的政論。郭嵩燾赴英途中曾據此書附錄談論教務問題，此外再無提及該書。¹⁰⁷ 然而，此書對郭嵩燾的影響遠遠超於他本人文字上的記載。從《中西關繫略論》卷一可見，林樂知將中國與英俄兩國交接，視為中外關係的重心，「論歐洲人散布中原而英俄與中原為接壤之國，其中交接當設法籠絡維持矣」。¹⁰⁸ 《中西關繫略論》還收錄了一張「交界圖」，以明英屬印度與俄國環伺中國的局面：



林樂知指出英國因商業競爭之需，急欲在中國開闢通商口岸，而俄國則為尋求海口通商覬覦高麗。他提出中國亟需設法富強，不富不強有礙西洋通商，洋人欲代中國為之。¹⁰⁹ 《中西關繫略論》分析俄國構患中國，並不局限於西北邊境，而是包括東北

¹⁰⁷ 《郭嵩燾全集》，第10冊，頁72、111。

¹⁰⁸ 林樂知：《中西關繫略論》（上海：美華書館，1876年），卷一，頁七下至十上。

¹⁰⁹ 同上注，頁九上至十二下。

要地乃至藩屬。¹¹⁰這些觀點，使郭嵩燾擔憂俄國的擴張，遠甚於他出使之前。郭嵩燾駐英初期，論及鴉片、傳教乃至喀什噶爾等奏摺時，亦應參考了《中西關繫略論》的見解。¹¹¹因此，1878年林、郭二人於倫敦相聚時，郭嵩燾向林樂知表達謝意說：「初奉派時，並不知西國各種情形，幸藉君之書為指南焉。」¹¹²

郭嵩燾修改日記時借鑑了《中西關繫略論》，令《使西紀程》的內容超出實際遊歷範圍，並非依旅途所見，「據實直言」。不過，這並非說郭嵩燾的寫作不能由此及彼，超脫肉眼所及的種種景象。事實上，郭嵩燾的日記常參引《瀛環志略》，使論述能超越時地限制，觸及西方漫長的歷史文明。例如，《使西紀程》關於中國景教的記載，即源自《瀛環志略》：「又有景教流行中國碑，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述。今考祆字從示從天，即天神，其教起於拂菻，即猶太摩西初建此國，耶穌乃其裔孫。」¹¹³郭嵩燾未曾閱讀景教碑文，誤將碑文作者景淨視為考證者，故日記誤作「唐初已有景教流行碑，所奉祆神，僧景淨釋以為天神，謂其教起於拂菻，則正摩西之遺也」。¹¹⁴忽略此處誤讀，景教與祆神也不應視為同宗。景教為基督教聶斯脫里派(Nestorianism)，經由波斯傳入中國；而祆教為波斯拜火教(Zoroastrianism)，較景教先傳入中國。¹¹⁵更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燾出使前已留意景教，他的私人日記有兩處相關紀錄：第一處寫於1855年前往浙江籌辦鹽務途中，記錄周騰虎(1816–1862)談論景教的觀點，稱唐朝景教為今之天主教，祆廟為景教所建，並簡述天主、耶穌分為二教；¹¹⁶另一處於1861年摘錄自吳鎬的文稿，稱大秦寺僧景淨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碑文首言判十字定四方為今之十字架，並指摩尼教、景教、祆神即波斯教為三夷教。¹¹⁷第二處紀錄區分祆神與景教的論述雖接近史實，卻不再為郭嵩燾徵引。在無法驗證的情形下，《使西紀程》關於景教的恢宏之論雖有紕漏，但不違背官方志書《瀛環志略》的觀點，故鮮受質疑。

林樂知將英俄通商擴張，視為處理中國外洋之患的核心，這一觀念與當時洋務外交書《萬國公法》、官方志書《瀛環志略》兩者描述的「春秋爭霸」國際想像迥異，顯

¹¹⁰ 同上注，頁七下至九上。

¹¹¹ 除奏摺外，值得關注的是郭嵩燾抵英後函告李鴻章處理洋務的信件。信件尚論及鴉片煙、喀什噶爾、伊犁等事務辦理方法，與《中西關繫略論》的關注點甚為相近。見《郭嵩燾全集》，第13冊，頁275–77。

¹¹² 《郭嵩燾先生年譜》，頁784。

¹¹³ 徐繼畲：《瀛環志略》，卷三，頁三七下至三八上。

¹¹⁴ 《郭嵩燾全集》，第10冊，頁112。

¹¹⁵ 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頁130–40。

¹¹⁶ 陸寶千：《郭嵩燾先生年譜補正及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頁33；《郭嵩燾全集》，第8冊，頁7。

¹¹⁷ 《郭嵩燾全集》，第8冊，頁539–40。

得異常突兀。¹¹⁸郭嵩燾在修改日記時逐譯了這一嶄新觀念，力陳英俄環伺爭霸之局作為警語。然而，《使西紀程》為紀實遊歷之作，這則日記既非親身聞見，又沒有說明論述依據，一時難以讓清吏信服。¹¹⁹何金壽指責《使西紀程》為「侈言」，清廷將原已贊助刊印之書燬版，亦應從這一角度考慮。身處倫敦的郭嵩燾無法得知內情，誤認為燬版純粹出於保守派的打壓。¹²⁰與林樂知處於同一英文新聞語境者，似未辨明《使西紀程》與清廷西學參考書的迥異之處，輕易將郭嵩燾所說視為如實講述的真相，進而將日記燬版解釋為掩蓋真相、盲目排外的敵對舉動。更諷刺的是，林樂知本為推進中外和平的言論，幾經流轉，竟成詆譏中國時政的根據。種種誤解，既是中英十九世紀中後期文化交往的見證，也是教訓。

七、結論

公使日記譯本歷來被視為摹本而鮮受學者重視，日記譯本如何影響西人對晚清中國的認知，有待學界作出更全面的梳理。本文利用大量未曾披露的檔案，考證《使西紀程》的三名關鍵譯介者，以及他們的英譯出版活動，進而以《使西紀程》為切入點，觀察晚清中英文文化的接觸、摩擦與碰撞。《使西紀程》經倫敦、香港與上海三地的英譯與報導後，成為英文世界的公眾焦點。遠在梁啟超、費正清等中外學者之前，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文報刊已採用「華夷之辨」解釋燬版原因，認為郭嵩燾在一則日記中「直言」西方富強而不容於保守勢力。相反，清廷諫官援引同一則日記，譴責郭嵩燾「侈言」時政，促使清廷禁燬原已批准刊印的書。造成中西閱讀分歧的根源，並非清廷恪守華夷觀念。第二次鴉片戰爭以降，清廷已逐漸消融華夷之見，官方使用的洋務參考書如《瀛環志略》、《萬國公法》等已採用「三代之治」、「春秋爭霸」等語，譯介西洋諸國著作。這則引起爭議的郭嵩燾日記，實建基於林樂知《中西關繫略論》的觀點。林樂知在書中將英俄通商擴張，視作處理中國外患的核心，郭嵩燾「逐譯」這個見解，在修改日記時力陳英俄環伺爭霸之局，藉以警示當權。然而，郭嵩燾出使英國，而未途經俄國，日記的論述又異於清廷的外交與史地參考書，難免被政見相左的諫官視作失實取媚。重審《使西紀程》在晚清譯史中的位置與作用，有助於反思日記燬版案在十九世紀中西讀者間引發的爭議。

¹¹⁸ 將美國民主制比附為中國三代之治以外，《瀛環志略》亦採用「春秋爭霸」來描述時局，如提到俄國時，稱「然在歐羅巴諸國中，亦不過比肩英、佛，而未能定霸於一方者……比權量力，不過齊、秦、晉、楚相為匹敵已耳」（卷四，頁二七上至二七下）。

¹¹⁹ 《使西紀程》除了記錄親歷見聞，引用他說，多提及論述依據。在這種情況下，無說明來源的條目，容易讓讀者產生語出郭嵩燾的誤解。關於《使西紀程》稱引他說而說明資料來源之處，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43、53-54、60、63。

¹²⁰ 《郭嵩燾全集》，第4冊，頁832-33。

侈言與逐譯：郭嵩燾《使西紀程》的西文史料稽考

(提要)

李佳奇

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是晚清首部駐外公使日記，出版後旋遭官方禁燬。既有研究側重運用漢文史料來探討燬版的成因，鮮少留意《使西紀程》乃至燬版案在十九世紀西文報刊的傳播紀錄。本文利用大英圖書館與各地檔案館蒐集所得史料，考察出使日記在倫敦、香港與上海三地的譯介軌跡，進而以此為切入點，觀察晚清中英文化的接觸、磨擦與碰撞。本文重點在考辨三名隱而不見的譯介者以及他們的英譯出版活動，指出英文報刊認為燬版肇因在於清廷無法忍受其中一則日記直言西方富強。然而，同一則日記卻被政見相左的諫官視作郭嵩燾取媚西洋諸國的「侈言」。本文從觀念「逐譯」的角度，探討這則日記的爭議之處，為出使日記燬版案提供新證。

關鍵詞： 郭嵩燾 《使西紀程》 西文報刊 譯本

Translation or Exaggeration: Guo Songtao's *Shixi jicheng* in the West

(Abstract)

Li Jiaqi

To gather reliable foreign intelligence, the Qing empire (1644–1911) ordered its overseas diplomats to submit their official diaries regular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uo Songtao (1818–1891), the first Chinese Envoy to the UK, depicted the thriving Western colonization project in his diary, *Shixi jicheng*. However, his writings were banned by the Qing court in 1877 for exaggerating the wealth and power of Western countries. A few researchers have noticed that Western newspapers disseminated the censored diary and condemned the Qing court for covering up the true narrative of the Wes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circulation trajectory of Guo's diary in Londo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o compar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terpretations on one key entry of the diary. It reveals that the controversial entry is not from Guo's own travel experience, but from his translation of a new foreign book. This case study will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oy diary as a controversial cultural medium in Sino-Western relations.

Keywords: Guo Songtao *Shixi jicheng* English newspapers translated versions